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〇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七四期 ——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011b)

|        |               |                 |
|--------|---------------|-----------------|
| 【运动记愧】 | “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 王友琴             |
| 【往事如烟】 | 一个老红卫兵的忏悔     | 李益荣             |
| 【拒绝遗忘】 | 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    | 苏晓康             |
| 【劫后反思】 | 恶之花会结什么果？     | 萧萧竹             |
| 【文献资料】 | 相对论批判（修改稿）    | 中国科学院“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运动记愧】

“带了个好头”：红卫兵道歉

• 王友琴 •

最近我看到一些信，有关44年前的事情。一些1966年的红卫兵中学生，向那时被他们“斗争”的老师道歉。在我这个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这应该写出来告诉大家。

故事的一方是程璧老师。她今年86岁，“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负责人。和许多教育工作者一样，程璧老师先被撤销了职务，后来被关押在校中。她遭到侮辱和毒打，头发被剃去半边，成了所谓“阴阳头”。

我做过调查。1966年8月，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礼堂里，用木枪、皮带和自来水管把幼儿园女工刘桂兰活活打死。“牛鬼蛇神”（那时对被迫害的人的总称呼）被强迫抬尸体。程璧老师和教导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个夜晚有五拨红卫兵来打过她。姚淑禧在女厕所里，把绳子挂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杀”了。

故事的另一方，是1966年时北京外国语学校的8名红卫兵学生。44年前他们十几岁，

现在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他们向程璧老师道歉，也在通信中忏悔了当年参与暴力迫害的行为。

1966年8月，从北京到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受难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蛮，史无前例。1979年前后，暴力迫害的受难者得到了平反，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钱的“补偿”。暴力迫害的施行者一方，当年那些红卫兵现在在想什么呢？他们认错了吗？他们是否愿意向受害者道歉呢？他们能忏悔吗？很多人还一直心存疑问。

我没做过普查，无从得知这8名道歉者，在红卫兵总人口中有多大比例的代表性。然而我知道，这肯定是应该赞扬的好举动。

第一封道歉信是申小珂写的：

程老师：

您好！

我是1966年高二（二）班学阿拉伯语的学生，我叫申小珂。我现在住在湖北省十堰市。我已经退休。

在学校时我和您直接接触只有两回，都是在“文革”中。一次是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把您叫到我们宿舍，问您为什么不执行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指示。还有一回是“复课闹革命”时期，我和您在我们教室（南边是梨园）有一次谈话。谈话内容，现在我都忘了。可能还是我用“极左”思想教训了您一顿。

现在回想起来，只有羞愧。但是我没有打过您，没有折磨过您。1968年春天把您和其他校领导关在男生宿舍一楼时，管你们的“典狱长”，就是我。

前些日子，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十分后悔。

想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今天我给您写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们学校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校友，请您宽恕我们。

1966年咱们学校正处在鼎盛时期，蓬勃向上、秩序井然的美好校园被“文革”打乱了。我们的好校长莫平、教导主任姚淑禧就惨死在那场浩劫之中。记得还有一个女工叫刘桂兰的，因为出身不好，也被活活打死了。

在这场浩劫中，咱们学校的很多同学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里受到巨大冲击，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为热爱毛主席，和家庭划清界限，悔恨、羞愧终生挥之不去，受伤的心灵至今不能平复。

程书记，您今年86岁，我妈妈83岁。我像希望我妈妈长寿一样希望您长寿。您对我有教导之恩，我妈妈对我有养育之恩。对您们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我是耿耿于怀的，所以不揣冒昧，给您写这信。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您指出来。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真诚地祝愿您健康、快乐！

申小珂

还有一封信来自胡滨：

程老师：

申小珂同学的道歉信也引起我对1966年“文革”初期的一些回忆，不知为什么，这些话直到“文革”后1982年我们又一次聚首相见在北京西便门小区的住宅楼时也没有再和您谈起过。对于这28年的迟钝和延误，我深感内疚。我记得在您丧失自由，被关牛棚的日子里，

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我虽然没有对您动粗，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我对您说过的错话，一定深深伤害了您。您还记得吗？我曾当着您的面指责过您执行了错误路线，成了此次运动的绊脚石和革命对象，并且勒令您写出认罪书。如果小珂说他那时是您的典狱长，那么我作为外语学校“文革”小组组长，负责领导学校运动，可以说是所有同学过火行为的直接罪魁祸首了。除了我们之间那次仅有的谈话，我曾经和几个高三同学在运动初期最早贴出了点名批判您和莫平校长的大字报；我也在革委会里带头同意接受群众要求，对您实行隔离审查，让您失去了自由。

在今天这个大雨纷飞的北国六月里，您当年那纤弱的身体和倍受屈辱的阴阳头仍旧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记忆中，让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难奈。在这里我首先要诚恳响应并附和申小珂同学致您的道歉信，小珂的道歉信，字字句句，情真意切，道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愿做您永远的学生，永远不忘您在逆境时的告诫和教诲。另外，我也再次把这些当年和您做邻居时都没有向您启齿的心里话说给您听，对“文革”初期同学们对所有老师以及包括您本人在内的所有校领导所说的任何斥责和错话，做的任何武斗、体罚和过火行为表示深深的内疚和歉意，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对于那些在浩劫中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师长、同学，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他们，永远给予我们的思念，为他们烧香祈福！

高三三班 胡滨

其他人的通信，因为篇幅限制不一一引用。上引两信都写得清楚明白，无需注释。但我还是想要指出这些信在道德上的意义。道歉还是不道歉，对这两个写信人来说完全是自由的选择。外界没有给他们压力要他们道歉，而且由于很多红卫兵至今不道歉，反而会给这些道歉的人造成相反方向的压力。他们二人也都不住在北京，远离当年受到迫害的老师，连人们常说的“人情债”都可以不必担心。他们写信，也全无获得名利好处的可能性存在，因为他们已经退休。申小珂和胡滨两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写了这些信的。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我们才能用纯道德标准来衡量以及赞扬。他们在自由的情况下作了道歉和忏悔的选择，正因如此，这是很道德的行为。

我还想指出的是，他们对道歉有很理性的认识。从他们和老师同学交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道歉不是仅仅出于一时感情冲动，也不对别人煽情。申小珂另一封信中讲到为什么写了道歉信。他说：“只有犯错不大的人，才好写这信——压力轻些。”（指他当过“典狱长”，但没有动手打过人）“这种信只有我这样的人写最合适。”（解释了为什么他首先出面道歉）他说明为什么他比动手打了人的红卫兵容易忏悔，同时也不因为后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有真的自由了，我们才真的轻松了，我们才和程璧、莫平、雷力、姚淑禧、刘桂兰——有了真切的关系。”道歉还是不道歉，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怎么设定道歉的内涵意义，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对道歉有很深的理解。

程璧老师给他们回信说：

小珂、胡滨同学：

前几天，苏平平、曹雪寒、初玉玲、郁小培、舒杭丽、黄禾同学来看我，带来申小珂和胡滨的信。你们不会想到，看到你们的信，我是多么的感激，多么的感动。你们给我的印象都是好学生。

我曾高二（二）班呆过一个多星期，不知是在什么形势下把我放在了班。我与杜宝莹同学同桌。他对我很好。申小珂、宋威威是班干部，很能干。当时我还没有“解放”，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和同学说话，但却在这个班的同学中感到平安。你们提到那时你们问过我什么话，我说过什么，我早已记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那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定为走资派。但是谁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蒙在鼓里。

你们的信，有些同学看后，有的说：“你们带了个好头。”有些同学为“文革”时的懵懂行为自责。还是小四班、小五班、初中的同学，那时他们年龄那么小，懂得什么呢？有些同学在“文革”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那是当时形势所致，我很理解。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小珂、胡滨的信，已代表了同学们的心声。同学们对我的赞誉，我真有些担当不起。

看到同学们上学时的照片，一张张可爱的笑脸，我真喜欢。有很多同学向我问好，向我祝福，串串美好的话语，我非常感动、欣慰和幸福。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程璧

2010年6月14日

程璧老师已经高龄，依然耳聪目明，神思灵敏。我们见面的时候，她给我看她写的追念莫平校长的文章。莫平在1966年也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的第二迫害高峰中，莫平“自杀”了。这个学校三个校级负责人，“文革”中有两个被迫害致死。程璧老师的文章写得清晰动人。我还注意到她的钢笔字迹也端正秀丽，和文字风格显示出一致的认真态度。

程璧老师还介绍我访问了她的同事和朋友林瑾。林瑾老师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第十一中学的负责人。我到达林老师家的时候，她已经写好了一份名单，字迹端正，排列整齐，写着1966年这所中学8名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我告诉林老师，我读韦君宜的《思痛录》，最感动我的一章，是作为出版社社长，她把出版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8个人都一一写了出来。而您也正是这样做的。44年了，您没有忘记他们，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

程璧老师和林瑾老师，我都是刚刚认识。她们对我亲切和蔼，我们的采访谈话进行顺利。为什么呢？首先，一定是对受难者的同情和记忆，给我们建立了互相理解的基础。其次，我能感受到的她们在持守道德原则方面的自我要求。这两点，也是外国语学校8名红卫兵学生道歉的思想来源。正如程璧老师信中所说，他们“带了个好头”。我写文介绍这些素不相识的道歉者，也祝愿这些道德绿洲常青。

□ 原载《南方周末》

~~~~~

【往事如烟】

一个老红卫兵的忏悔

• 李益荣 •

在老同学儿子的婚宴上，昔日的“红五类”和“黑五类”同桌共饮，其乐融融。当我把自己新出版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岁月》送到每一位同学面前时，一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老红卫兵神秘地把我请到他的坐旁，指着张老师为本书做的《序》轻声问道：“你和张老师还有来往？”我脱口而出：“我们来往很密切，因为我们曾经都是‘牛鬼蛇神’，处境相似，脾气相投，性情相近。”张老师是我们初中二三年级时的语文老师，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儒雅精干，风流倜傥，然而，性格耿直，心直口快，因此，在大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班的红卫兵拿他开刀，首先在班里进行批斗，随后又送到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受尽了凌辱和折磨。而我属于“黑五类”子弟，也被红卫兵在班里屡屡批斗。当年，我们可谓惺惺相惜，同病相怜。老红卫兵听完我的话，轻轻地叹了口气，深有感触地说：“人要是做了亏心事，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感到内疚。”

此时，《婚礼进行曲》响起，欢快的乐声和主持人诙谐的话语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不一会儿，在新郎新娘的祝福声中，婚宴又推向一个高潮。四十多年后的老同学频频举杯，觥筹交错，半杯汾酒很快见底。此时的老红卫兵已是满脸通红。当大家再次碰杯后，他俯下身来，怀着复杂的心情对我讲述了“文革”期间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那是在1966年8月，红卫兵纠察队刚刚在太原市兴起。一天上午，高三年级的红卫兵头目把我和许多同学召集到学校大操场，大家排成一行，被要求逐个自报三代家门，作为参加红卫兵纠察队的政审条件。第一位同学自豪地大声喊道：父亲是革命干部，母亲是革命干部，爷爷是革命干部。头目赞许道：通过，请出列，站到那一边。第二位同学吞吞吐吐地说：父亲是革干，母亲是地主……头目不容他再往下说，指了指校门口说：你这种出身的人居然还混进了红卫兵队伍，赶快滚！轮到我时，由于心中没底，于是犹豫不决地说：父亲是革干，母亲是中农，爷爷是革干。头目思忖片刻指着我说：你先原地蹲下，最后再说。政审结束后，头目对我说：你可以留在学校闹革命，能不能参加红卫兵纠察队，关键就看你在运动中的表现。

为了实现自己加入红卫兵纠察队的愿望，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批斗老师的运动中去。当班里批斗张老师时，自己上窜下跳，煽风点火，表现得很积极。记得当时找不到合适的器物往张老师背上插“牛鬼蛇神”牌子，红卫兵便拿起一把扫帚用白纸糊起来，写上“打倒张某某”插在张老师背上。但是由于张老师只穿了一件白衬衣，牌子插不牢，常常东倒西歪，于是红卫兵不住地过去狠劲往下戳。很快，纸被揉破了，扫帚的竹枝把张老师的后背戳的红一道，紫一道，白衬衫上血迹斑斑。此时，另一个班也传来了“打倒胡某某”的口号声，我过去一看，原来他们正在批斗我们的美术老师。那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记得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说：我姓胡，湖南人。然后就讲起了他在延安时的亲身经历：起床后一眼望去，雪白的窗纸上映着自己剪的窗花，灿烂的朝霞洒满小院，走出窑洞，伸个懒腰，望着延河水滚滚流去，心情无比舒畅。虽然这诗一般的语言长久地在同学们中传诵，然而，胡老师留给我的印象却并不愉快。在一次美术课上，我把油彩里兑上水去画画儿，违背了胡老师的要求，当即受到批评，而且，那个学期的美术考试胡老师没有让我及格。从此，我对这位小个子湖南人怀恨在心。看到胡老师被批斗，我毫不犹豫地上台控诉了他对我的“迫害”，从而将批斗会推向了高潮。胡老师随后也被送到了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

由于我在学校的几次批斗会上表现突出，红卫兵头目很快找到我说：你的表现很好，经研究正式吸收你为红卫兵纠察队队员。你虽然没赶上第一批被毛主席接见，还可以参加第二批。于是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红卫兵纠察队，当天晚上，便和其他红卫兵去附近的街道斗争一位“牛鬼蛇神”。那是一位60多岁的老者，清风峻节，白发苍苍。我们将一块沉重的大牌子挂在老人胸前，细细的铁丝在老人苍白的脖子上勒出道道血痕。抄完家后，红卫兵又去批斗老人和他的家属。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和暴风骤雨般的打骂声中，那位老者一直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们。斗争会一直持续到深夜。会后，我穿着父亲曾经穿过的旧军装，戴着红卫兵纠察队的袖标独自兴冲冲地往家走。此时，马路上行人寥寥，昏暗的路灯把我的身影一会儿拉长，一会儿变短，我不由地想起那位老者怨恨的目光，心中充满恐惧。于是，不住地自己给自己鼓劲：干革命就要天不怕，地不怕……

不久，我便去了设在解放路天主堂的红卫兵纠察队总部，由于我去的晚，纠察队发放手电筒时没有领到。于是，我给学校打电话，命令胡老师，在次日中午12点之前给我送来一支四节电池的大手电筒。当我拿到手电筒后，一些同样没有领到手电筒的同伴不住地夸我机灵，于是，他们命令胡老师给每人买了一支手电筒送来。由于胡老师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因此，当有人提议把他扣留在天主堂时，我没有同意。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把胡老师留下，他也许早就被打死了。因为，红卫兵总部对“牛鬼蛇神”的斗争更野蛮、更残酷。有一次，红卫兵斗争国民党的一位军官，他身材魁梧，腰杆笔直，典型的军人形象，而且十分坚强。红卫兵要求他低头

弯腰，他坚决不从，而且大声疾呼：士可杀而不可辱！此时，北京来的红卫兵煽动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坏人打好人，冤枉；好人打坏人，活该。有人大声喊道：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于是，一阵乱棍齐下，那位军官立刻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瘫倒在地。气息奄奄的他第二天便一命呜呼了。还有一次，红卫兵斗争育婴堂的一位神职人员时，竟然残忍地让他吞下十几粒中药蜡丸，饱经摧残的他很快也撒手人寰。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这些场面来依然感到恐怖和愧疚，仿佛那些怨恨、屈辱、仇恨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常常彻夜难眠。前些时候，在街头碰到张老师，其实我们都认出了对方，但是，想起“文革”中对老师的不恭，自己默默地低下头匆匆离去。

此时，新郎新娘过来给我们斟酒，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在欢快的气氛中，老红卫兵一直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与自责中。他接着对我说：“那些年，你在班里也吃了不少苦，我们都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宽慰他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都很幼稚，很容易被人欺骗和利用，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应该总结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都是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人。”

□ 2010年8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

### 【拒绝遗忘】

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

• 苏晓康 •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二十年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着“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幸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于饥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 ◇ “前转型”追溯的奇观与困境

国际知名政治转型专家 Louis Bickford，界定转型正义是指“原先不民主的社会，如何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人权侵犯、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创痛（包括种族灭绝或内战），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正义、和平的未来”，政治学上称此为“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无疑，不论是二战后对德国纳粹反人类暴行的追究，还是南非种族迫害的“真相调查”、南美对前军政府暴行的追讨、东欧各国对共产党罪恶的清算，无一例外是“转型后”的追究与矫正。

当下中国民间，调查追究执政当局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似无前例。台湾在威权体制主动放弃独裁、主导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实行“追溯正义”，亦为罕见，也对大陆发生强烈的启迪作

用；然而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特殊，也有“夹生饭”之嫌，民间颇感不平。

中共不仅拒绝蒋经国式的“和平转型”模式，更是强烈防堵九十年代共产体制大坍塌的“苏东波”效应在中国发生，以国家力量反“和平演变”、维持稳定，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民间的“追溯正义”，发生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对此我们能做怎样的延伸解读呢？

首先，民间得以在“转型”前追溯正义，却是中共预留的空间，因为它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二十七年，虽不敢“砍旗”非毛化，却是“不争论”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减弱定性……这种合法性的断裂，变成每一届“中央”都在默认甚至鼓励民间质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个时期的“正义缺陷”。历史地看，邓小平为挽救执政危机，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义”，而这点“正义”，恰是“邓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由官方主导转型，也是“夹生饭”，近似台湾做法。

那么，邓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惧”性质？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〇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帐，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于“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二十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与此并列的，还有民间“单方和解”的冲动，反复向中共发出呼吁，显示了这种转型前“追溯正义”，正努力变成“转型”本身。但可疑之处是，人们对“转型正义”机制比较茫然，那是从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了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个主环节，是图图大主教受命于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调查”两年多，共听取两万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证词，最后形成五大册调查报告。没有暴行调查，“正义”无从生成，谈何“追溯”？又怎能“宽容”？

转型前的“追溯正义”无可非议，但它也诱发种种政治幻觉。防止中国崩溃，并非与中共“和解”可以获得，毋宁这样的“和解”，是以牺牲受害者做交换的，更不要说中共宁愿中国崩溃，也不跟你交换政权。

#### ◇ “人亡政息”说

中国人曾一直相信，这个党“有改过自新能力”，这既是转型前“追溯正义”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民间保持“和平转型”巨大期待的诱因。曾几何时，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中国人却迟迟不能接受。

即使从政治转型的角度去看，邓小平也做了某种“转型”——从全能主义转向后极权，他的“实用主义”曾获举世称誉。但是“改革”一旦触碰政体，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挽救执政合法性，跟党内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赵紫阳的悲剧，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八九冲突中，冷静透彻地看出学生运动与“颠覆政权”丝毫不相干，轻易便可化解，而动用暴力镇压则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将彻底葬送执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决策，却在中共僵化的体制内部，得不到理解、认同、拥戴，一句话，没有合法性。此时邓小平的头脑里，一点实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个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邓与赵的改革理念，都是“救党救江山”的权宜之计，但赵紫阳得了邓之“实用理性”的真传，有执政成本的概念，邓却停留在打江山时代不计代价的“低级层次”。政治不

讲成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非常可怕。当年开了杀戒，邓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们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掉天安门。这就是后来确保G N P年年以十递增的一个政治遗嘱，邓小平要拿中国的“江山”（nature）去换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继承者的执政目标，就是执行这个政治遗嘱，于是这个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败，那是因为它必须绑架所有中国人去替它还债，不腐败怎么做得到？其后果由网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颇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们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反贪局审查，很多人要被枪毙。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因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银行查收，荷兰的红灯区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商店会冷清一半，德国宾士和宝马工厂将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世人皆言邓小平没有蒋经国开明，其实谈不上“开明”二字，根本是一个愚昧的问题。以“追溯正义”为例，对“二二八”的责任，民选上台的李登辉，不对蒋介石深究，只描述为“失察”；轮到陈水扁当总统，改为“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并摘除“中正纪念堂”匾额；再轮到马英九上台，又将匾额挂了回去。如此拉锯，看似可笑，却都要经立法院投票。台湾政治学家吴乃德教授指出，“国民党要保护的或许不只是其领袖的神圣历史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毕竟国民党没有“人亡政息”。

#### ◇ “代罪羔羊帮”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着，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富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于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叹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于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有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到基督教这里，耶稣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国文革施害者们，有没有这份殊荣，全看他们的造化了。这个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在中国一向匆匆，中共护着他们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宁，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问了。



在“施害者”这个话题中，德国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 或译《生死朗读》），是最先锋的诠释，他用文学试图证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赎成为可能，司法和正义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无辜”，其实是一种前知识、前良知的状态，你可以惩罚一个罪人，若不能使他认罪，“正义”便没有真的落实。施林克刻意将前纳粹女看守汉娜设计成一个文盲，却酷爱古典名著，营造出一种“无辜”的张力；文盲使她在“社会资源”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为掩饰文盲而去做集中营看守，又为了保护这点隐私，而在法庭上独自认下大罪，只好终生坐牢。

但在狱中汉娜学会识字，认识了“大屠杀”历史，良心发现并认罪忏悔，祈求被害者原谅，也做出象征性赔偿，虽然她终于不能返回社会而自杀身亡，但是救赎和正义皆勉强达成。汉娜的悲剧具有很广泛的象征意义，如中国文革中，再具体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各年级女生，也谈不上“社会资源”，的确是该案的“施害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据说没碰卞校长一手指头！

战后德国第二代的道德挣扎，是小说的副线，同样震撼人心，而中国的“八零后”，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这回事。文革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们，而今都到了“耳顺”之年，学识上最不济的也有大学文凭，留洋博士如过江之鲫，早已溢出“无辜”的范畴，且至今荫蔽于父辈权势，“社会资源”丰沛，大多是社会名流，未闻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苏醒。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为这一群的标志性人物。

#### ◇ “满街都是刽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后是更为广阔的一个含义：“共业历史观”。民族创伤是全民共同的记忆，中国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陈芳明论及“二二八”事件，认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绑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历史时，把事件的苦难当作全体岛上住民的共业，视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枷锁。”

与德国纳粹世道相比，中国“十年文革”也许有很多差异，但有一条，即老百姓被领袖（元首）裹挟为帮凶，规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个；但在“追溯正义”一端，又由于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大相径庭，所以《朗读者》展示的反省、救赎的精神层次落实到中国，尚为遥远。中共“不纠缠历史旧帐”，封尘文革罪恶，可视为另一种“闭关锁国”，禁锢中国人之心智于历史教训和普世价值之外，耽于物质满足而无他求，这种社会一旦崩解便成人间地狱。

人类社会演成暴民乱世，到二十一世纪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于今为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评价《朗读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现象：“以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而言，学者大多认为，大部份寻常百姓在意识形态煽动与实作『磨练』下，都不难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危机状况下尤然。大屠杀的刽子手不必是变态狂或边缘人，大部份老百姓都无法抗拒现代操控机制下的洗脑，换句话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单单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就都有数十万人参与屠杀自己的邻居、亲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万、千万人计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普世问题。”

一个社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若不能超越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恩怨，则无从建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设若中共隐瞒历史、禁锢民智，后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个毛泽东，文革再现可在须臾之间，“满街都是刽子手”那一幕，降临中国还会远吗？

~~~~~  
【劫后反思】

恶之花会结什么果？

• 萧萧竹 •

2005年9月间，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本埠举行多种纪念活动。其中有一台《傅庚辰作品音乐会》，电视台为此播送了预告片，我也看到了。

我的一位熟人，某日告诉我——他们一家也看到了该预告片，他的五岁男孩看完后问他：“爸，那个哥哥为啥打那个老爷爷？”

呵呵！他是说预告片里引用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傅庚辰为该片作曲）里的一个镜头：“小英雄”潘冬子拽着条绳索，绳索那头套着大地主、还乡团长胡汉三。潘冬子使劲一拽，胡汉三一个踉跄……

这是拍摄于“文革”中的一部著名电影，那时除了样板戏之外就准生了这样不多的几部电影。直到2010年8月28日和9月12日，央视音乐频道还在播放该电影，足见此片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的主导者看来，尚未过时。

笔者算是“红旗下长大”的了，这类文艺作品从小就看得多了，《槐树庄》、《收租院》、《暴风骤雨》……总之，“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铸造了我们的灵魂。我们被告知要“夺过鞭子揍敌人”，我们被带到农村“四清”批斗会的现场，观看“四类分子”如何被“触及”灵魂与皮肉……

我们的人生品格，在暴力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整整一代年轻人，血液中注入了暴戾的因子。一有机会，这种心魔就会从躁动中释放出来，演变成暴虐的行动。

所以，“文革”一来，千千万万个“革命小将”涌现出来了，像蝗虫般扑向神州大地。那些个“地、富、反、坏、右、资”有难了，……

请看当时《红旗》杂志的描述：

——革命的小将吼声震天：要革命，要造反！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文化革命的暴风雨，来势迅猛，如泰山盖顶，如怒涛汹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66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

可是，当“伟大领袖”把口风轻轻一转，说“党内走资派就是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时（70年代，更是直截了当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就把原先套在胡汉三脖子上的绞索，直接套在了“领导我们闹革命”的老干部脖子上了。

请看“老革命”陈丕显的回忆：

……“专案组”人员除了逼我交待所谓“罪行”外，就是以批斗、折磨我来取乐。他们明知我身患重病体质虚弱，却千方百计变着法儿来折磨和摧残我，除了对我大声辱骂、拍桌子、瞪眼睛之外，还经常逼我罚站、低头弯腰认罪、不让我喝水；他们还毫无人性地搞什么“车轮

战”、“蘑菇战”，一连几天，甚至一连两个月连续批斗，……（《陈丕显回忆录》）

“陈丕显老同志”对此当然想不通，他在游街的路上，产生了一番想法：

——站在车上，“游”过这一条条熟悉的街道，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悲怆：土地革命时，我们打土豪分田地，让顽固地主游过街；进城后，我们搞三反五反，让反革命分子、不法资本家游过街。没想到今天我竟成了游街的对象！（《陈丕显回忆录》）

“陈丕显老同志”显然认为后一种游街是合理的，前一种游街则不能接受。要“陈丕显老同志”打通这两种游街的联系，显然是不实际的。我们还是引用一位思想者的话，来点破这一层关系吧：

“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林昭）

章立凡先生在《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1951年，川东“土改”，在川东行署副主席魏思文的主持下，上演“烹人”一幕：天星三村“吊打中打死了女地主何敬修”，“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地主何芸樵及儿、媳二人被吊打……其大儿媳第二天上吊自杀，另一地主何郁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钟就死了。”“该村吊打了八人……死二人。”……

十多年后，升任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多年的魏思文却在1967年10月30日惨遭毒打致死。（《记忆——往事未付红尘》82页）

原来佛经上的因果报应是有的。

“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圣经》

~~~~~

## 【文献资料】

### 相对论批判（修改稿）

• 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一九六九年十月

## 目录

- 一、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和爱因斯坦相对论
- 二、相对论的大前提和哲学相对主义
- 三、相对论的时空观和资产阶级唯我论
- 四、相对论的基本原理被实验证实了吗？
- 五、驳相对论的苏修辩护士
- 六、结语

## 前语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不朽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手稿，曾被臭名昭著的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扣押了三十年之久，以致伟大的列宁都没有看到。但是就在列宁逝世的那一年，伯恩斯坦却毕恭毕敬地将这份手稿呈给现代物理学的“鼻祖”爱因斯坦，请他予以评价。

爱因斯坦在他的答复中，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写道：“不论用现代物理学的眼光看，不论用物理学史的眼光看，这些札记都无特殊价值。”

然而，就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写下了一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胆敢蔑视唯物辩证法的爱因斯坦也总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被誉为现代物理学与理论基础之一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浸透着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蔑视，这同样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 一、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和爱因斯坦相对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自然科学做过这样一个极其深刻的论断：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但它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渗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

纯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体系，并不是具体规律的堆积，而是一定阶级的人在一定宇宙观的支配下，对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获得的经验所作的概括、总结和解释。这样，就会渗入人的阶级意识进去，从而介入现实的阶级斗争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是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深深地渗进资产阶级意识并介入现实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典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空前激烈。面对着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动的资产阶级完全抛弃了他们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利用过的哲学唯物论的工具，变本加厉地祭起了哲学唯心论的破烂，妄图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相对抗。

资产阶级在哲学上这种进一步的反动，深刻地影响着西方自然科学界，特别是物理学界。

当时，随着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人们在探索微观领域及宏观高速领域运动规律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同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古典物理学发生尖锐矛盾的现象，它们猛烈地冲击着占统治地位的牛顿形而上学的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物理学正经历着一场急剧的变革。

牛顿机械观认为，宇宙中存在一种脱离具体物质的、绝对不变的永恒流逝的时间，叫“绝对时间”。而空间是同时间无关的、绝对不动的空架子，叫“绝对空间”。物体在“绝对空间”中做着“绝对运动”，它们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广延性（即时空特征）及其他基本属性都与运动无关。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古典电磁学要求整个宇宙空间充满着绝对静止的传光介质——“以太”。但是，不仅在力学领域内，而且在电磁学和光学领域内，人们当时都无法发现物体（比如地球）相对于那种“以太”的“绝对运动”，相反，科学实验的成果却暗示着物体的时空特性及其他基本属性会随运动状态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些矛盾（以及在微观领域中遇到的其它矛盾）迫切要求发展新的理论对问题的本质加以解释和概括。

在自然科学急剧变革的时期，哲学的指导作用总是表现得尤其突出。当时正是这样。

大多数物理学家沿着自发的唯物主义方向，企图用电磁相互作用的具体变化过程来解决上述矛盾，这是当时新物理学的中心内容之一。

以马赫、彭加勒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科学家则趁机否定物质客体的存在，散布“物质消失了”等谬论。他们强调“主观直觉”的作用，叫嚷要“探求那种尽可能排除物质假说的纯粹抽象的理论”，宣称“到达成熟期的物理学，已经不需要用那些粗糙的形象（按：指研究具体相互作用的物理模型）来膜拜自己的神了。”这样，就在物理学发展的转折关头掀起了一股唯心主义逆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从同工人运动内部的马赫主义者作斗争的需要出发，对这股“物理学的”唯心主义逆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并且指出，科学试验的新成果“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然而，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物理学家都不能自觉地突破牛顿机械观的束缚，而“表现出对辩证法的完全无知”。

正当物理学理论在牛顿机械观的禁锢下停滞不前，而唯心主义者又切盼能出现一种用“主观直觉”建立起来的“纯粹抽象的理论”来完成他们梦寐以求的“大业”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一九零五年应运而生。

爱因斯坦认为，牛顿力学中的“相对性原理”应推广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原理：对于一切匀速直线运动的观察者（物理学上叫做“惯性参考系”），任何一个物理定律都有相同的形式，即这些观察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他认为这个原理当然也应适用于光的传播，于是又进而提出“光速不变原理”：一个观察者，不管他以多么大的速度运动，“真空”中同一束光对于他总有相同的速度，都等于每秒30万公里。

爱因斯坦以这两个原理为大前提得出：在静止时完全相同的两组钟和尺，如果携带他们的观察者之间有了相对运动，两人就都会发现对方的尺比自己的短，钟比自己的慢。而所有这些时空变化都没有具体的物理原因，完全由观察者与客体之间的相对速度决定。不仅物体的时空特性如此，物体的质量等属性也有相应的变化。

爱因斯坦用这些结论对古典物理学在宏观高速领域内所面临的困难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的理论蕴含着事物的时空特征及其他基本属性会随运动状态不同而变化的思想。这些，在物理学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对牛顿机械观和牛顿力学来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和革新。

但是，爱因斯坦又深受马赫主义反动哲学的影响，他十分自觉地把这种反动哲学渗进相对论的理论体系中去。而他对自己的理论所作的哲学概括，则更为荒谬，处处是赤裸裸的相对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货色。

爱因斯坦认为，时间和空间完全是主观的和相对的。他说：时间本来是“个人的经验”中事件的“序列”，对于个人来说，就存在着“我”的时间，也就是主观的时间，其本身是不可测度的。而为了使不同观察者的“经验互相协调，并将它们纳入逻辑体系”，可以“约定”共同的对钟计时方法，这样，“时间的概念就变成为客观的了”。

因此，在他看来，事物的时间一律是由观察者的钟来“定义”的；空间也是一样，是由观察者的尺来“定义”的。要研究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规律吗？只需要把不同观察者的钟和尺的读数“互相协调，并将它们纳入逻辑体系”就够了，除了这些读数之外，更本质的东西是没有的。

根据这套时空观念，相对论公式中不同观察者看同一物体有不同的时空测量值等。就得这样理解：既然时空测量值就是时空本身，测量值不同就意味着一事物具有分属于各个观察者的不同的纯属相对的空间广延性和时间持续性，不指明是对哪个观察者而言的，他们就都没有意义。

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才把他的理论叫做“相对论”。他得意洋洋地宣称：相对论“去掉了空间和时间最后一点物理客观性”。

机械唯物论是抵挡不住唯心论的进攻的。在相对论（以及随后诞生的量子力学）取代了牛顿力学而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的同时，渗透在这些理论中的唯心主义也乘机取代了机械观，在整个物理学界大肆泛滥起来。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哲学上的任何倾向，总是直接间接助长着他们所属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害。在这意义下，哲学中的一些倾向的贯彻，便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政策的特殊形态。正当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的时候，唯心主义在自然科学中的泛滥完全适应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于是，他们凭借着在这个领域中的传统优势，披着“最新自然科学”的外衣，向无产阶级的战斗唯物主义发起了猖狂的反扑。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现在。

他们兴高采烈地说，相对论“把一切归结为一些关系”，“物质的性质是无关紧要的”；相对论“证明了连空间和时间也是不能和感觉分离的直觉形式”，从而把唯心主义认识论“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声称，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还丝毫不知道今天的相对论，由于相对论的问世，“物质看来成为一种由我们感官和感觉过程的相互作用所创造出来的第二性现象”；他们公然叫嚣，与列宁期望现代物理学会产生辩证唯物主义相反，相对论产生了一系列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矛盾的基本见解，大肆为杜林、马赫之流翻案。

早在二十年代初，列宁就已注意到了这股新的唯心主义逆流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爱因斯坦的学说已被各国资产阶级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所利用。他深刻地揭露了那些随之而起的大大小小的哲学流派的反动性，强调要对他们进行坚决斗争。此后三十年中，苏联学术界对相对论一直抱着谨慎乃至批判的态度。

然而，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苏修及其追随者马上跟在西方资产阶级后面，学着他们的腔调，把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捧上了天。苏修中央委员、马列研究院院长费多谢耶夫亲自出马，大骂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采用相对论的时空观念；苏修“哲学问题”杂志又以编辑部的名义，突然宣告相对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具体科学的证明”，为相对论贴上了“马列主义”的标签。法修中央政治局委员伽罗迪胡说什么过去对相对论的批判是对物理学的“可恶的‘哲学’干涉”，波兰物理学“权威”、爱因斯坦的大弟子英菲尔德则更为猖狂地叫嚷：“愚昧的时代终于告終了”，大骂辩证唯物主义使人“心悸”，“已经几乎成了空口袋”，“已经到了黄昏时期”。

这种情况也迅速反映到我国来。党内外大小修正主义分子和一些物理学“权威”完全照搬了苏修的观点。有人甚至提出，必须根据相对论“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运动、空间、时间这些范畴的学说。

修正主义“权威”们对相对论的吹捧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篡改与攻击，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喝彩。他们得意地说，苏联学者已经和他们的观点一致了。他们甚至头脑发昏地预言，一场新的“唯心主义革命”即将到来，而“包含着深刻的唯心主义”的相对论，比起这场“革命”

的哲学“先驱”来说，“或许是更有意义的”。

几十年来的事实表明：围绕着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 二、相对论的大前提和哲学相对主义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包括在大前提里面。我们对相对论的批判，也应当从分析它的大前提：“光速不变原理”和“相对性原理”入手。

爱因斯坦在回忆他建立相对论的经过时说，他“对于依靠已知事实通过创造性的努力来发现真实定律的可能性越来越感到绝望。”“越发相信只有发现一个普遍的形式上的原理”才能得到“精确有效”的结果。他“直觉地感到”，“光速不变原理”和“相对性原理”正是这样的原理。

可是，把这两个大前提一搞成绝对“精确”的、“普遍”的，爱因斯坦就开始把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意识掺进了相对论体系中。

先来看“光速不变原理”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可是“光速不变原理”却说光在真空中对于不同观察者的速度是宇宙中绝对不变的东西，没有任何相对变化！

按照这个“原理”，爱因斯坦直接得出了“光速不可超越论”。硬说宇宙万物的运动速度都不可能达到或超越真空中的光速；而爱因斯坦及其信徒又从这个“不可超越论”导出了“宇宙有限论”，“时间量子不可分割论”，“物质密度极限论”以及“因果关系转化速度不可超光速论”等等奇谈怪论。

真是荒谬至极！

有限和无限是对立的统一，无限不能离开有限单独存在，而有限的本性就在于超越自己的界限并转化为无限。列宁指出，这是“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时间进程本身的辩证法。”物质世界的层次是无限的。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光子也是无限可分的。属于物质运动某一层的光传播过程，它的速度必然会由于种种内因和外因而发生变化，超越自身的“界限”，更不可能成为什么宇宙万物运动速度的极限。认为宇宙中有一种不可超越的极限速度，正如认为宇宙中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基本子一样，完全是形而上学的。

很明显，把“光速不变原理”绝对化并用它来主宰一切，就使光的传播成了宇宙中绝对最初的和绝对最后的运动形态，而把人类禁锢在一个由光来确定其极限值的“有限世界”之中。

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精确度范围内，光速可能具有某种近似不变的性质。是否真是这样，需要由实验来决定。不过我们在后面还将指出：迄今为止，这一点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专门实验的证明。

至于“相对性原理”，它在相对论及整个现代物理学中比“光速不变原理”具有更根本的意

义。必须着重指出：把相对论原理绝对化，就必然会陷入哲学相对主义。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事实上，西方唯心主义者早就宣称，“相对性原理就是哲学相对主义的原理，就是仅仅根据观察者的观点来描述事件。”

相对主义否定事物的任何绝对性，主张只有纯粹的相对。在运动观上，它的表现就是否定运动的绝对性，主张运动是纯粹相对的，并进而否定运动的客观性。

早在十八世纪初，老牌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就提出：上、下、左、右，所有方向和位置以及运动“就其本性而言是相对的”；“直到给出某种关系，使物体在这种关系中得以存在以前”，所有方向和位置以及运动“都是不可理解的”。注意，按照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公式，“不可理解”就是“不存在”。贝克莱的这套观点得到了另一个老牌唯心主义者康德的赞同。

马赫则说得更干脆：“对我来说仅仅存在相对的运动。”

爱因斯坦完全继承了贝克莱和马赫的衣钵。他把相对主义的运动观作为提出相对性原理的哲学依据，从而使相对主义又被披上了“二十世纪最新自然科学哲学”的外衣。难怪西方学者在提到相对论时，总忘不了对他们的哲学前辈推崇一番。他们说，贝克莱那些话“超越了他的时代许多年”，“是相对性原理一个非常清晰的表述”。爱因斯坦更是满怀敬意地说，马赫就是相对论的先驱，如果马赫能够注意光速不变的话，他也会发现相对论的！

列宁曾经指出，物理学中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乃是一种反动的并且使人一时迷惑的东西”。现在，是对这种反动的东西进行彻底清扫的时候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它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以及它同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都是客观的、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这就是说，任何事物内部，都无条件地、永恒地、因而绝对地运动着，并总是同其他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着；而这种内部运动和相互联系的绝对性与普遍性，又都只存在于具体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运动过程之中。

当我们仅研究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发展变化（即外部运动，例如机械运动）时，必须看到，事物的外部运动也是以各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为根据的，而且事物之间的外部运动总是通过“中介”内部的矛盾运动实现的。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地球和太阳能够互相联系，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有质量等属性；“A”这个符号不能绕太阳运动，是因为“A”没有这些属性，没有地球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内部矛盾性。此外，地球和太阳的相互联系，还必须通过“中介”才能实现。作为各个运动物体相互联系的“中介”空间物质总是存在的，而且是不可穷尽的。如果既否认外部运动要以内部矛盾为根据，又否认一切“中介”的作用，那就势必会把外部运动看成是纯粹相对的而否认其绝对性，并进而把一切运动归结为纯粹外部关系的产物，贝克莱、马赫和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他们正是通过这个途径连物质运动的客观性都给否定掉了。

在物理学中，当我们观测、描绘课题的外部运动时，应当看到世界上没有真的“空”，客体同周围空间物质的相互作用，同样是客观的、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因此，近似地忽略空间物质同客体与观测仪器的相互作用，认为客体与观测仪器在空间中的整体运动不改变描绘客体运



动过程的物理定律的形式，不同观察者之间的运动只有相对的意义，这样做只能是有条件的（牛顿力学就是如此）。当空间物质的影响不能忽略时，不同观察者之间的运动就不能再看作是纯粹相对的了，对不同观察者来说物理定律的形式也就不能再认为是相同的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像相对性原理那样忽略空间物质的影响，是要由实验来决定的。只有这样来理解相对性原理，才是正确的。

辩证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纯粹的绝对是没有的，凡绝对都只存在于相对之中；纯粹的相对也是没有的，一切相对之中都包含着绝对。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可是任何机械唯物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个“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他们完全抹杀了事物的内部运动，而对于外部运动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也只能有浅薄的理解。一提运动的“绝对性”，他们就只知道是牛顿那种纯粹的“绝对运动”；一提运动的“相对性”，他们就只知道是贝克莱和马赫那种纯粹相对的运动。于是在否定了牛顿“绝对运动”观念之后，他们就只好把“相对性原理”绝对化，结果当然在整个理论中把绝对和相对的关系系统歪曲得不像样子。请看爱因斯坦，他把相对性原理当作“普遍的”、“精确有效”的原理，“直觉”地用到光的传播上去，并由此建立了时空观念，这样就恰恰使得光相对于不同观察者的速度变成了完全排斥相对的绝对，就恰恰使得事物时空特性及其他基本属性的变化都不能有任何具体相互作用的原因，都只能由观察者与对象之间的相对速度这种纯粹外部关系所决定，都变成了完全排斥绝对的相对！

在相对论诞生后不久，列宁就曾经根据当时物理学中唯心主义泛滥的情况尖锐地指出，一些新物理学家，“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列宁的话，正好击中了爱因斯坦渗进相对论的反动哲学的要害。

其实，相对主义者也并不是完全不要绝对。爱因斯坦虽然否认了客观事物内在的一切绝对性，却也还有他的“绝对”：他那两个“原理”不就是“绝对”的吗？进一步说，他的“直觉”不就是“绝对”的吗？一切相对主义者，原来都是“以我为核心”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 三、相对论的时空观和资产阶级唯我论

时间和空间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人的“直觉形式”，从来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时空观念上的根本分歧。

毛主席教导我们：空间和时间都不是独立的非物质的东西，也不是我们感觉性的主观形式，它们是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客观的，不存在于物质之外，物质也不存在于它们以外。

和运动一样，事物的时空特征，也是由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诸方面的对立统一所决定的，事物时空特征的变化，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同样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以及它同周围事物的矛盾关系所造成的。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究极原因，也是事物时空特征存在、变化、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究极原因。这一切都是不随观察者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承认这一切，应当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根本前提。

可是，爱因斯坦根据他的两个大前提建立起来的那套纯属相对的时空观念，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毫无共同之处。他那个没有测量和感觉，时空就没有意义的公式，仍然是与贝克莱

的“没有参考物体就没有时空”的唯心主义观点一脉相承的。而他关于时间不过是“个人经验中”事件的“序列”的观点，与马赫关于“空间和时间是感觉序列的调整了的（或者协调了的）体系”的观点更是如出一辙。

列宁在揭露贝克莱和马赫这种“感觉复合论”的反动本质时写道：“如果物体像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或者像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组合’，那么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

列宁这些话，完全适用于对爱因斯坦时空观的批判。

爱因斯坦还并不只是停留在哲学上。从他对“不同地点两个事件的同时性”问题所作的“精心”分析开始，他又十分自觉地将这种时空观深深地渗进了整个相对论的物理内容中。我们必须来一个再分析，以便澄清爱因斯坦造成的混乱，进一步揭露他经过什么具体的路径从相对主义陷入了“最纯粹的唯我论”。

同时性这个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很容易碰到的。例如，“北京和上海同时看到日出”，“日本和意大利有两座火山同时爆发”，“天空的闪电同时击中了两处铁轨”，……都讲的是“不同地点两个事件的同时性”问题。可是，爱因斯坦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了一番文章。

他说，这些例子根本没有意义！你怎么知道这些事件到底同时不同时？你根据什么来判断？在没有找到一个测量手段来看看这个同时性是否成立之前，同时性的概念就不成立。如果在不同地点两件事发生时，都向你发出一种不需要时间就能传播的信号，那么当然只要看看两个信号是否同时到达你这儿，就能判断两件事是否同时发生，而且不管你在何地或如何运动（例如站在地面上或坐在飞驰的火车上等等）结论都是一样，因为反正信号传递不要时间。可是爱因斯坦又说，可惜，这是被牛顿绝对时空观念“蒙蔽住了”。事实上并不存在不要时间就能传播的信号，所以你不能判断那些事件是否同时发生。其实，根本“不存在像不同地点事件的同时性这样的东西”！

但是，没有“同时性”，全部与计时有关的工作不都成问题了？不是连各地的钟都对不成了？

爱因斯坦回答说：这好办。“不存在”而又在测量中需要的东西都具有“任意性”。为了使“经验互相协调”起来，也可以任意“约定”一种共同的“定义”作为测量操作的依据。只有这样，谈论不同地点的同时性问题才有意义。用什么来“定义”呢？当然用光最方便，因为有个“光速不变原理”，光在所有惯性系中任何方向的速度都是同一常数。只要你站在两事件发生处之间的中点，事件发生时又有光发出，那么如果两束光同时到达你这儿，就算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

问题就这样产生了。如果闪电击中了相距很远的两处铁轨，两处中点的人只要同时看到闪光，他就会根据“定义”，认为闪电是“同时”击中的。可是，一个在飞驰火车上的人，如果在闪电击中铁轨的一瞬间（从地面上判断）刚好经过地面上那人身旁，由于闪光传来需要时间，等他看见光，火车已经前进了一大截，结果他就先看见前面来的光，后看见后面来的光。按“定义”，既然没有同时看见光，他只得认为对他来说闪电“不同时”击中。

同一时间怎么能有两个结果？谁判断错了？爱因斯坦说，谁也没错。因为按照“相对性原理”，地面和火车上的两个人地位完全“平等”，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同时性和运动一样，本来就纯属相对，完全随观察者的运动状态为转移。不指明是哪个观察者（参考系）看的，根本

就谈不上同时不同时。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谓的“同时性的相对性”。

正是有了它，相对论才断言，事件的时间进程、物体的空间大小乃至物体质量等等基本属性也是纯属相对的，完全随观察者和客体的相对速度这种外部关系为转移。也正是这个效应，被西方资产阶级吹捧为“爱因斯坦哲学中的一个最精微深奥的观念”。使他的相对主义时空观大大超出了他的哲学前辈。

爱因斯坦自己对建立这套奇妙观念的逻辑推理也颇为得意地说，认识到同时性的“任意性特征”“实际上已经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而对于他“发现这个重要之点所需要的判断的推理，阅读大卫·休谟和恩斯特·马赫的哲学著作特别起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什么“问题的解决”？向哪里“促进”？

难道因为瞬时传播的信号不存在，同时性就根本“不存在”吗？难道为了“协调经验”就可以“任意”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下“定义”吗？这样一来，由此导出的物质的空间、时间等各种属性的变化岂不也都成了根本“不存在”而且是“任意”的吗？

不同地点的同时性问题，不过是时间、空间和运动相互联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也是由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诸方面的对立统一所决定的。在任何事物内部，同时性这种时空和运动相互联系的特殊形式，总是普遍地存在着，因此是绝对的；而同时或不同时，又都是由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具体情况决定的，都是有条件的、可变的，因此又是相对的。北京和上海是否同时看到日出，是由两地的地理位置和地球在太阳系中的运动客观地决定的；两座火山是否同时爆发，是由地球内部物质运动的具体过程客观地决定的；两处铁轨是否同时受到雷击，是由空中电击穿的具体矛盾运动客观地决定的。不管有没有瞬时信号，不管人们是否用爱因斯坦的方法去测量，他们都是客观存在，毫无“任意性”可言。

除了上述由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所决定的同时性问题之外，在事物之间同样有相应于各种特定外部联系的时空特性和同时性问题。事物内部运动的的同时性特征，正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显示出来。就拿雷电击中两处铁轨那个例子来说，两个事件和不同状态的观测仪器之间有不同的外部联系，因此有的观察者可能同时看到闪光，有的观察者可能不同时看到闪光。这些不同的观测结果，都是雷电击中两处铁轨这一客观的内部运动过程对于各个观察者的相对表现。和讨论物体外部运动时的情形一样，它们仍然都是以事件和观测仪器的内部矛盾性为根据的（“A”这个符号就没有这种矛盾性），而且都是受“中介”自身的运动状态所制约的。因此也都是客观的、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至于不同观察者的观测结果是否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按“爱因斯坦同时性效应”的公式变化，或在什么条件下这样变化，同样是要由实验来决定的。

应当注意“中介”不同或观察者的运动状态不同，同一事物的内部运动过程对不同观察者的外部联系就不同，因而观测结果就不一样，各个不同的观测结果各自都只对于特定的一种外部联系才有意义，不能互相混淆；此外，绝不能只看到不同观测结果之间的相对性而否定其自身的绝对性。更重要的是，事物的时空特征和同时性本身是一回事，人们对它们的观测又是一回事，绝对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更不能由于观测结果不同而否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存在，否定事物内部和外部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时空特征的变化、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客观存在，否定不同地点同时性的客观存在。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

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事物的时空特征对于不同观察者的相对表现，雷击的闪光是否被同时看到，这都是现象；事物的时空特征是否发生了真实的变化；两处铁轨是否由于空中电击穿的具体矛盾运动而同时遭到雷击，这些才是本质。只有透过现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质，透过观察者与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去揭示事物自身的属性，从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回到实践中去，这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但是，和对待运动的问题一样，在对待同时性的问题上，机械论者和相对主义者的观点也都是极其浅薄的。他们都只看到各个事物之间外部联系的同时性问题，而且即使对此也都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

在牛顿那里，宇宙万物相互联系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那个在“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中传播的假想的绝对不变的瞬时信号。这样得到的同时性当然是完全排斥相对的绝对。

爱因斯坦虽然否定了牛顿的绝对同时性，却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他对同时性所作的“精微深奥”的分析简直是一片混乱。他把不存在“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歪曲成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具体的“中介”，这样，他就完全否定了外部联系的同时性的客观背景；他又把事物内部运动的同时性及其相对表现混淆起来，进而全盘否定了事物内部运动的同时性的客观性。为了“协调经验”，他又“任意约定”另一种假想的绝对不变的光信号作为“定义”同时性的唯一标准，从而把同时性变成了主观任意的东西，完全陷入了“最纯粹的我论”哲学。

对此，爱因斯坦有一个绝妙的自白：“光速不变原理”“实际上既不是关于光的物理性质的假定，也不是关于光的物理性质的假说，而仅是为了得出同时性的定义，我按照我自己的自由意志所能作出的一种约定。”

好一个“自由意志”的“约定”，爱因斯坦的我论哲学在这里暴露得再充分也没有了！

很明显，以这样一套时空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整个理论体系当然只能把事物的时空特征及其他基本属性的观察效应和真实的物理变化混淆起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爱因斯坦正是这样，把相对论体系搞成了“红楼梦”中那个“太虚幻境”，把人们的认识引上了歧途。

恩格斯曾经说过：“在自然科学本身中，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理论，在这些理论中真实的关系倒置起来了，映像被当作了原形，因而必须把这些理论同样地顺过来。”

不难看到，即使相对论的某些具体公式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了实验的证实，它也至多只能描绘事物与观察者之间的外部关系，而且是“倒置起来”的东西。这种理论必须“顺过来”。

#### 四、相对论的基本原理被实验证实了吗？

目前，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和对相对论“精美”体系的信仰，在整个科学界（特别是物理学界）仍然统治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这里面，除了反动阶级的需要之外，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不少人认为，真空中光速的不变性在电磁学上和理论上都反复获得了证实。甚至有人恐吓说，批判相对论“就是同物理科学的所有实验相抵触”。

真是这样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斯大林也说过：“科学所以叫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旧物，却很仔细倾听实践经验的呼声。”

为了弄清相对论的物理内容究竟被实验证实到何等程度，我们对有关专门验证相对论的各种实验进行了调查，并重新作了分析。

调查表明：相对论确有若干公式已被许多实验事实证明了，而且在许多领域内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不从这两个原理出发，也可推出相对论中那些和现有实验符合很好并有广泛应用的公式。

用直接测量单程光速的办法来检验“光速不变原理”，就要遇到如何确定起点和终点的两个钟是否同时起动的的问题。而在相对论中这两个钟又是根据“光速不变原理”来确定是否同时起动的。这样就陷入了逻辑的循环。所以单程光速从来就没有人测过。

从八十多年前著名的迈克尔逊实验直到近年来人们做的各式各样高精度的检验相对论的实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实验，证实了光速与光源的运动无关。通常认为这就验证了“光速不变原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只有在相对性原理可以用于光传播的前提下，光速与光源运动无关这一事实才等价于“光速不变原理”，而相对性原理是否可以用于光的传播，则从来没有得到实验的验证。

第二类实验（包括迈克尔逊实验），验证了双程光速在各个惯性系中的各向同性和不变性。而“光速不变原理”却要求单程光速在各个惯性系中的各向同性和不变性。“单程光速”和“双程光速”一字之差，远隔千里。不难理解：虽然单程光速不变必须保证双程光速不变，但往返平均的双程光速不变却不能保证往或者返的单程光速也不变，正如上坡和下坡骑车的平均速度有可能等于地面上的车速，但是上坡车速和下坡车速各自都不等于地面上的车速一样。因此，这一类实验也没有证实“光速不变原理”。

第三类实验，专门验证相对论的某些推论，例如，运动的“钟”变慢、运动的物体质量变大、质能关系、横向多普勒效应、运动媒质中的光速（包括相对论诞生前的菲索实验）和其它有关的电磁学实验等等。一般都认为这些实验唯有用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才能解释，因而验证了它们也就验证了这些原理。但是具体的分析表明：只要从双程光速不变出发，在迄今所有有关实验的精确度范围内，也都能解释这些实验。

这样，上述实验所充分证实的，仅仅是双程光速不变而已。如果硬要单程光速不变，还得多发现一个效应，这就是那个“爱因斯坦同时性效应”。唯有这个效应，才是相对论的独特产物，是任何现有的研究相互作用的物理理论无法推导出来的。可是，就像捉迷藏一样，这个效应在几十年来所做过的一切实验中（在其所达到的精确度范围内）都没有出现过。例如，在测量横向多普勒波长移动的实验中，相对精确度已达  $10^{-7}$  次方，但用双程光速不变即可解释，要用这种实验来检验“爱因斯坦同时性效应”，精确度还需要提高几个数量级。

当然，如果一上来就假定单程光速不变，也就包含了双程光速的不变性，因而可以得出那些符合实验结果的公式。相对论之所以能在表面上说明一些现象，其“秘密”原来就在这里。

必须强调指出，凡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同时性也不例外。分析

和计算表明：“爱因斯坦的同时性效应”虽然在目前已做过的所有实验中没有得到检验，却是可以在另一些条件下加以检验的。因此，这就进一步驳倒了爱因斯坦的“同时性任意论”和“自由意志约定论”，从物理上具体地证明了同时性的客观实在性。

说到这里，事情已经很清楚：认为相对论的前提可以用“自由意志”加以“约定”，是完全荒谬的；而认为相对论的前提是实验充分证实了的客观真理，也完全没有根据。这样，就向整个相对论理论体系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

然而，那些拼命吹捧相对论的资产阶级“权威”，居然还要狡辩。最近有人竟公然宣称：“理论这玩意儿，从来都说不上有什么实验证明，只要有用就行了！”。在他们看来，现有的某些物理理论并非只是应用相对论中被实验证明了的部分公式，而是离开了整个相对论体系及其全部时空观念就寸步难行。所以，相对论根本怀疑不得，批判不得！

所谓“有用”，说穿了，不过是他们离开了“偶像”和“过时旧物”就混不下去罢了！这种人，不是在宣扬一种类似宗教的迷信又是在干什么！

究竟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统帅自然科学的研究，像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还是既不用正确的宇宙观作指导，又回避实践问题，继续盲目崇拜爱因斯坦这个‘偶像’，跟在洋人的‘自由意志’后面爬行？每一个革命的和郑重的科学工作者，都会作出明确的回答！

毛主席教导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错误。”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把革命的批判和科学实验紧密结合起来，扫清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系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断前进！

## 五、驳相对论的苏修辩护士

毛主席教导我们：“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苏修叛徒们打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招牌对相对论的美化和吹捧，也是我们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为了识别真假辩证唯物主义，为了肃清苏修辩护士的谬论在我国哲学界和科学界曾经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必要再费一点笔墨，对这些辩护士的谬论稍加驳斥。

这帮“权威”说，虽然相对论把空间和时间以及在空间和时间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弄成了观察者与对象之间外部关系的产物，但物质并没有消失，不过得到所谓的“四维时空统一体”这个“客观存在”中去寻找。

他们又说，空间和时间构成“四维时空”，“体现”了空间和时间可以“不依赖于物质的运动”而“自身相互联系”。

他们还说，“四维时空”是绝对的，而将它划分为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分法则是随观察者的运动状态为转移的，是相对的，因此不是相对主义，而是“体现”了空间和时间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

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说，相对论“证明”、“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完全是一派胡言。

“四维时空”是什么“客观存在”？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指出，物质的运动本身是以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为前提的。很明显，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两种不同形式，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合二而一。怎么能说，由于出来了一个相对论，运动物质的三维空间广延性和一维时间持续性这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就变成了“四维时空”这一种假想的物质存在形式按观察者的不同运动状态而划分的两种相对表现？“四维时空”至多不过从数学上表述了事物的时空特性同观察者与客体之间相对运动的外部关系，，用为数学的方便而引入的“四维时空”来否定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实践和空间的客观性，这完全是荒诞无稽的。

什么时间“不依赖于物质的运动”而“自身相互联系”？

这只不过是重弹时间和空间可以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滥调。列宁早就说过：“在时间性事物之外的时间＝神”。苏修叛徒们为了给相对论贴金，不惜为神灵开了后门。

什么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

苏修“权威”们所玩弄的那套把戏，不过是把空间和时间客观的绝对性歪曲成假想的“四维时空统一”的“绝对性”，把空间和时间客观的相对性歪曲成将“四维时空”划分为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分法随观察者为转移的“相对性”而已。尤有甚者，这样一来，在他们所谓“四维时空统一”中，时间和空间的“同一性”完全成了绝对的，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却完全成了相对的了。这哪里是什么一分为二的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法，完全是合二而一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

应当指出，上述谬论都还是苏修“权威”们在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的观点。到现在，连这些谬论都不够时髦了。他们几乎完全抛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成了老唯心主义者和西方资产阶级种种“最新”哲学流派的无耻的传声筒。他们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贝克莱的话，声称只有存在参考物体时“运动的概念才有意义”，大肆宣扬“在时空中没有任何必要赋予粒子以广延性”，等等，等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今年二月，苏修中央委员、科学院副院长、反华小丑鲁米扬采夫竟然在一篇极端反动的臭文章里，公然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大叛徒考茨基，抄袭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祖师爷贝克莱以及康德关于上、下、左、右纯属主观的和相对的这个唯心主义观点，直接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矛盾论”，配合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武装挑衅，投入了声嘶力竭的反华大合唱。

六十年前，列宁曾经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俄国老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在哲学方面“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的情况：“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囔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囔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宣扬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同时带着蔑视的意思对辩证法耸耸肩；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

请看，苏修叛徒们的行径，和他们的修正主义祖宗们相比，是何等相似啊！

六、结语

空间、时间和运动不是我们感觉性的主观形式，它们是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事物的时空特性及其他基本属性的发展变化和相互联系，都是由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诸方面的对立统一所决定的，因此是客观的，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他们都不是由事物与观察者的外部关系创造出来的，而只是显示在这种关系之中。当我们看到它们的相对表现时要注意到现象背后还有本质，在相对表现背后还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物质属性。这样，我们就不会停留在对事物相对表现的感性认识上，就会认真地通过实践发现产生这些相对表现的原因，上升到理性认识，并在进一步的实践中使自己的认识得到检验和发展，一步一步地提到高级的程度。坚持了这些，我们就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

相对论蕴含了空间、时间和物质基本属性可变的思想，是对牛顿力学的重大革新。但是，爱因斯坦又是在贝克莱、休谟和马赫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建立他的相对论的。他在理论中限定了事物时空特性和一切属性的变化不能有任何相互作用的原因，因而只能把它们都归结为观察者与事物外部关系的产物。这样，相对论就至多不过是停留在描绘事物外部关系的低级阶段的理论而已。而爱因斯坦还从哲学上把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形式颠倒成感觉的主观形式，只承认空间、时间和运动的现象相对性一面，抹杀了它们的客观实在性，完全违反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与运动、空间与时间、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本质与现象、属性与关系这些范畴的学说，通过相对主义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堵塞了人们进一步认识物质世界的道路。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理：一事物的属性并不是它与其它事物的关系所创造的，而只是显示在这种关系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商品的基本属性之一，它不是由交换关系创造出来的，而只是显示在这种关系之中。人们正是要透过商品交换中的种种现象，揭示商品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实质。然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只看到在流通过程中统一商品价值的各种相对表现，就断言价值是在流通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由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因而统一商品可以有无数个“价值”，并企图以此否定价值实体的存在。马克思曾对这种自由贸易贩子在每日市价行情表中研究商品“价值”和“价值量”的“理论”进行过彻底的批判。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庸俗的经济学者丝毫不知道，实际的日常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可能等同的……庸俗的经济学者以为他拿出事物外部表现有所不同的事实来傲然反对揭明事物内部联系，就算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其实，他所引以自傲的，是向外表屈膝，是把外表当作实质。那么试问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呢？”

“但是，在这里面还隐藏有某种别的东西。事物的联系一被了解时，对于现有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全部理论信仰就要倒塌，……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需要把糊涂观念永远保持下去。”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所说的这些话，对我们了解渗进相对论的反动哲学的本质，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和苏修叛徒集团为什么对爱因斯坦如此竭尽吹捧之能事，不也是极有教益吗？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新华民（美国）思语（美国）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

---